

1949 年的中共和 2018 年的朝鲜

2018 年 6 月 9 日 3:30 AM 文/于大勇 来自/联合早报

若问中国人 John Leighton Stuart 是谁，能回答出来的估计不会太多；但若问是否听说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点头的人或许会很多。对，他就是出生在中国杭州、首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前美国驻华大使。

1949 年 4 月 23 日，解放军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未随国民政府前往广州，而是通过其秘书傅泾波向中共发出了愿意直接接触的信号。中共于是派出原燕大学生、时任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的黄华，与之进行了首次试探性会面。

从 5 月 13 日首次会晤至 8 月 2 日最终启程返美，司徒雷登与黄华一共密谈了四次，还派自己的秘书与黄见面五次。大使虽然明确表示“华府无意卷入中国内战，并打算逐步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但双方都在试探对方高层的真实意图，因此措辞口吻都相当谨慎。

司徒雷登这一秘密外交使命的根本目的，是要从中共方面取得“新政权不会与美国为敌”的保证，以此作为考虑与中共建立新关系的基础。他还询问是否可以在他回国述职前，假道北平与周恩来会面，中共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和安排。

可是，该方案最终遭到美国国务院的否决。司徒雷登于 8 月 2 日离开南京返美，中美密谈也由此无果而终。8 月 8 日，毛泽东写了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

十字路口的抉择：“同”与“不同”

后来担任过中国外长的黄华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周恩来当年透露过的一个细节：司徒雷登曾通过民主党派人士向中共转达过以下口信，说如果新政权愿在美苏之间采取中间立场，不完全倒向莫斯科，美方愿一次性给予新中国 50 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其重建经济。

这一切最后当然都未发生，但如果相比 1950 年中苏结盟之初，苏联对华提供的援助贷款仅为 3 亿元，以及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和中美恢复邦交的历史逆转，有学者提出，中共当时作出的所谓“一边倒”的外交决策是否是最佳选择？

今天的平壤政权也站在类似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同志加兄弟”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另一边是国际头号强权美国“宿敌”。朝鲜和中国同志的关系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暗中紧张与不和谐，最近才有了明显的缓和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自韩战以来则长期敌对，最近双方才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老特朗普向小金正恩表示，只要你彻底弃核，我一定为你“提供安全保障”，让朝鲜成为“非常富裕的国家”。明眼人一看便知，特朗普是投金正恩所好，因为这两点恰恰是平壤政府的最大关切所在。

作历史比较，很难找出两个完全匹配的案例。但这不等于历史事件彼此没有任何可比性。相反，我们从“今天”中往往能找到不少“昨天”的影子。

就自身地位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1949年夏的中共与2018年的朝鲜既有诸多非常不同的地方，也有若干类似之处：譬如，朝鲜目前只占半岛的一半，中共当年也才夺取了半壁江山；不同的是，中共尚处内战之中，并未建国，而朝鲜作为国体已存在70年。

从态势上看，中共当时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取得了南京，最终胜利几成定局；国际上，背后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作后盾，对西方的大门也并未完全关闭。再看今天的朝鲜：在内闭关自守，家族统治；在外相当孤立，外交余地较小；常年推行“先军政治”导致民穷财尽，国势趋下。

另一个雷同之处是，对当年的中共和眼下的朝鲜而言，美方的援助表示的确也给两者提供了能够“少一个敌人”的机遇。但不同的是，华盛顿当年所展示的“善意”，是对胜券在握的中共的某种承认和期许，以及对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失望和厌恶；今天的平壤则是特朗普用来对付中国的一张牌，和向国内民众展示其手腕的场域。

从国际环境看，两者亦有类似之处：无论是当年的中共还是今天的朝鲜，背后都有一个比较强大和坚定的支持者（苏联挺中国，中国挺朝鲜），而这两个后盾对受援者（当年的中共和今日之朝鲜）的战略诉求雷同，即，让其成为自己与战略对手（美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

换位思考“拥核”问题

根据上世纪80年代解密的材料，就在美国大使1949年5月中旬与中共开始秘议的一个半月后（6月下旬），刘少奇便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秘密访问。这次密访持续到8月中旬，也就是司徒雷登8月初离开中国之后。

一个是“密议”，一个是“密访”。同样都是个“密”字，却派生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密议最终流产，中美从此对立了 20 多年；密访确定了中共建国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在之后的 20 年里建立了“同志加兄弟”的密切关系。

但同志归同志，涉及到核技术，同志也不管用。

刘少奇那次去莫斯科，也对苏联的核武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对此非常谨慎，只允许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莫斯科并不真正相信中共新政权，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反观中国今天对朝鲜核计划的反对，以及对半岛无核化的主张，似乎也能看到当年苏联对华核立场的影子。

问题是，正如苏联当年的抵触和限制，反而加快了我国独立研制核武的步伐一样，我国对朝鲜拥核的反对，也成了平壤“先军政治”的某种助推器。金家三代都认为，你中国不顾苏联反对研制核武，为何现在却来反对我做同样的事？

同样可以作比较的是，我国当年快速推进核计划，开始当然不是针对苏联，而是因为在我国在韩战中公开与美国为敌后，担心华盛顿会对华动用核武。与苏联交恶后，我国的核武器客观上也对苏具有某种战略威慑作用，但这已是后话。

同理，金正恩大张旗鼓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现阶段当然也不是针对我国，但他一旦真正拥核，肯定也会对我国产生威慑“副作用”。

这一对比也反映了两者的另一个相同之处：对公开的“敌人”或“对手”，自然不存在信任问题，但即便在同一阵营中，信任也是奇缺的。我国决定自力更生，当然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核威胁，但同时也是出于对苏联反对和限制的一种“逆反”。今日之朝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还有，苏联当年反对我国拥核，也是因为担心北京“毛手毛脚”或“一时冲动”之下，可能会草率启动核武，或引发东亚地区的核竞赛；也担心美国由于过于敏感而率先按动核按钮进行“第一打击”。鉴于中苏之间当时存在着《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旦出现这种失控局面，苏联将被迫拖入一场它不愿意介入的核战争。今日之我国对朝鲜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担忧呢？

平壤未来可能的选择

1949年，中共作出了选择。那么，2018年，朝鲜又会作何选择呢？

这里其实涉及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一、朝鲜未来在中美之间会选择“一边倒”还是“中间道路”？二、在“一边倒”的情况下会倒向哪边？三、若走“中间道路”，会更偏向中国还是美国？

若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参考中共当年作出选择时的历史条件，从以下几点入手：

- 一、“红色血统”。金家世袭与劳动党的理论指导，均源自马列主义及其与本国相结合的“主体思想”。
- 二、历史渊源。金家三代与中共和中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表面上还存在。金正恩不久前二访中国时，重新强调父辈们建立起来的战友情谊，不管是策略性的表示，还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起码是对这种“历史渊源”的某种肯定。
- 三、美方诚意。一如中共当年怀疑美方的动机和诚意，与美国交恶几十年的朝鲜又焉能轻易相信华盛顿？
- 四、体制匹配。朝鲜的体制是更接近中国还是美国？这恐怕是一目了然的事儿。还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西方援助的背后总带有某种“釜底抽薪”的图谋，但北京无意改变朝鲜的体制。
- 五、发展模式。“西方模式”虽然依然强劲，但问题越来越多；而“中国模式”却正一路高歌，后劲十足。关键是，在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动荡之后，中共依然是中国的中坚力量，其领导地位不容置疑。这么看，哪个模式对朝鲜的发展更有借鉴意义呢？
- 六、战略目标。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退回到“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状态中，而中国反而成为多边合作和全球化的坚定拥护者。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带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双赢多赢格局，美国目前遵从的则是“我赢你输”逻辑。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更愿意追随哪种战略目标呢？

综上所述，平壤的现实政治虽然还可能“进一步退两步”或摇摆不定反复无常，但未来的长远选择取向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

- 一、金正恩不会选择“一边倒”，因为这种外交模式会束缚自己的手脚，限制自己的空间，而金本人是位喜欢游走于各方之间的博弈家。

二、金正恩会走偏向于中国的“中间道路”，因为中方不会危及他的政权，而且也有能力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援助，但美国未必会长期接受平壤的政治制度。无论从体制配置、历史渊源，还是从可匹配性角度看，“中国模式”都更适用于朝鲜。

三、金正恩将向美国以及西方世界逐步开放，一方面最大量地从中获取经贸好处，同时也能在需要的时候对中国打“欧美牌”。

站在朝鲜的立场，平壤在“拥核”问题上应该不会很快自废武功，彻底放弃。为了确保自己的家族利益和国家安危，金正恩会想方设法保持其核武潜力。但是，面对中美两国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金又将如何做到这点？我们拭目以待。

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经过几个回合的博弈，世界已经没有理由再嘲笑平壤的这位“少主”了。在他的领导下，朝鲜正在逐步走出孤立的局面。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平壤在“拥核”问题上应该不会很快自废武功，彻底放弃。为了确保自己的家族利益和国家安危，金正恩会想方设法保持其核武潜力。但是，面对中美两国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金又将如何做到这点？我们拭目以待。